

# 环龙路 青年毛泽东在上海的生活圈

上海环龙路2号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虽然前面有个“老”字,其实这条弄堂并不老,至1920年建成不过7年时间。为了和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开建过来与它相通的新渔阳里有所区别,于是它就变老了。

## “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

中共三大一次会议上选举出了中央局5位成员: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工作需要,又增补王荷波。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局并担任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党的三大决议: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担任工作。于是在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执委中,李大钊等当选为中央执委,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多人当选为候补执委。中共三大以后,党中央机关又搬回到上海。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

当时毛泽东除了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外,同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委、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主任等职。这一次他居住在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甲秀里7号(现威海路583弄云兰坊7号),距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不过1公里。这一年端午节前后,杨



▲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

开慧和她的母亲带着两岁多的毛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也来到这里,一直住到1924年底,他因身体原因辞去了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带着妻儿一块儿回到了湖南。1937年初,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谈话中称,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1924年3月,国民党决定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并决定由上海市执行部负责上海地区、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投考黄埔军校学生在上海复考事宜。毛泽东亲自挑选并介绍蒋先云、伍文生、张际春等一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学习。以后这些人都成了我们党军事力量的骨干。

## 和毛泽民在此永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7月15日宁汉合流,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

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干革命一定要有枪杆子,我准备到农村山林去做‘山大王’。”8月底,他匆匆赶到长沙东乡板仓,与杨开慧以及毛岸英、毛岸青和1927年4月4日出生不久的毛岸龙道别,到乡下领导秋收起义。

1930年10月,湖南军阀何健抓住了杨开慧,将她以及毛岸英与保姆陈玉英关在长沙狱中,11月14日将杨开慧枪杀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虽然毛岸英被乡绅们保释出狱,与两个弟弟一块儿回到了板仓外婆家里,但他们生活困难,还时常受到何健“斩草除根”的威胁。毛泽东获悉杨开慧牺牲,十分难过。他趁三弟毛泽覃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机会,找到二弟毛泽民,让他设法将三个孩子带到上海。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已答应接受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的领袖的子女赴莫斯科学习生活。毛泽民写信给板仓杨开慧的母亲以及其

他亲属,还化名寄去了一点钱,让他们尽快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送到上海。

1931年春节刚过,杨老太太等带着3个孩子来到上海,当天晚上就由毛泽民与夫人钱希钧安排住进了旅馆,他们经周恩来同意,决定把3个孩子送到共产党办的大同幼稚园。

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烈士遗孤流落街头,生活十分困难,有的孩子就此失踪了。1929年周恩来指示“共济会”的王弼,找一个可靠人士,办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烈士遗孤以及在前方作战的领袖子女。王弼找到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廉商量,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在上海圣彼得堂担任牧师的董健吾。

董健吾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又是一位虔诚的牧师。他与宋子文是同学,在国民党上层有许多朋友。听到组织上的决定,他一口答应,卖掉了祖上留给他在青浦的50亩田,租下了教友肖志吉在戈登路(今江宁路)441号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在1930年3月办起了“大同幼稚园”。过了不到一年,他又觉得戈登路的房子离英捕房太近,不够安全,更重要的是把孩子整天关在石库门里,没有活动场所,对健康不利。于是他就将幼儿园搬到了陶尔菲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一幢坐南朝北的两层

楼房,这里与环龙路正处在同一直线的位置,中间隔着一条通往公园的小路,环境幽静,离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仅几十米远。天气晴朗时,孩子们每天都到公园里去游玩。1931年3月,毛泽东的3个儿子毛岸英(8岁)、毛岸青(7岁)、毛岸龙(4岁)被送到幼稚园。

1931年端午节,毛泽民与夫人钱希钧要离开上海赴瑞金,临行前,夫妇俩专门到法国公园看望在公园里游玩的3个侄儿,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毛岸英还特意写了一封短信,托叔叔带给自己的父亲。谁也不曾想到,就在此后十多天,毛岸龙突然发烧腹泻,陈凤仙急忙抱着孩子赶到距离幼稚园不远的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患了紧口痢,此病十分凶险。虽经抢救,但他还是在半夜里病亡了。

之后,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大同幼稚园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凶险,被迫在1933年春解散。孩子们分别被亲友或地下党有关人士收养。毛岸英、毛岸青直接搬到了董健吾的家里。1936年6、7月间,经董健吾穿针引线,由张学良资助并委派自己的部下李杜将军,带着毛岸英、毛岸青等坐轮船离开上海到法国,由当时在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的康生接到莫斯科。

据《解放日报》吴基民/文

## 下台后,赫鲁晓夫每天都在忙什么

1964年10月2日,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1894—1971)在会见了印尼总统苏加诺后,立即飞往南方海滨疗养地度假。休养中的赫鲁晓夫仍然兴致勃勃,不停地过问各类国务活动。10月12日苏联的3名宇航员乘坐一艘宇宙飞船离开地球。当宇宙飞船飞完第3圈时,赫鲁晓夫想通过无线电话与宇航员通话,祝贺他们成功。

在极度兴奋中,他没有发现,他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已经中断。就在这一天,苏共主席团扩大会议背着他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在会上有人提议撤销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在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成为一个靠领取养老金过活的退休人员。官方宣布他去职的原因是“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

10月14日凌晨,苏联所有印刷厂都暂停工作,几千名检查人员和编辑仔细地审查准备出版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从手稿和校样中删去一切

有关赫鲁晓夫的字眼。成千吨已经印好的书籍和杂志被扣压在仓库里,准备送到造纸厂。

赫鲁晓夫在“退休”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处于精神恍惚、惘然若失之中,常常几个小时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有一次,赫鲁晓夫的孙子所在学校的校长好奇地问:“你爷爷在做什么?”这个孩子回答:“爷爷总是在哭。”

不久,赫鲁晓夫逐渐恢复正常,开始读报以了解外界的变化。

幽居中的赫鲁晓夫对自己过去的一些行为感到有些后悔。1962年至1963年间,他曾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对苏联艺术家的批判运动。他本人实际上对美术一窍不通,也很少有兴趣。负疚的心情促使他让亲属把这些遭受打击的画家和雕塑家请来,表示歉意。其中有一位雕塑家伊兹维斯特内后来应邀为赫鲁晓夫的墓塑碑,墓碑黑白相间,隐寓着艺术家对这位昔日显赫人物的评价。

在无所事事的闲暇中,赫



1959年,赫鲁晓夫受邀访美,“玉米运动”的灵感便来源自这里

鲁晓夫一度对摄影着了迷。他弄齐了全套摄影器材,并能拍出很好的照片。他主要选择大自然作为摄影对象,拍摄雪地、树木和花鸟。

赫鲁晓夫更多的时间是用于种地,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花园和菜园。最使他感兴趣的是种西红柿,他种了200棵良种西红柿,每天清晨4点起床给西红柿浇水,每棵果实都很大,丰收在望。不料一场早霜毁了这些西红柿,他非常伤心。但很快他又继续做实验,热衷于无土栽培法。

曾经干过钳工的赫鲁晓夫订购了各种铁管,不顾“年

迈和健康恶化”,亲自弯管并在上面钻孔。他准备好溶液和混合剂,等着获得好收成。他信心十足地对人说,无土栽培法具有很大的前途,是农业的明天。不过收获时发现:这样生产的黄瓜和西红柿比普通要贵十倍。他便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周围的人都彼此开玩笑说:幸好赫鲁晓夫不是在10年前迷上无土栽培法,不然的话,又是苏联农业的一场灾难了。

时间长了以后,赫鲁晓夫开始到附近散步。住地旁有一个休养所,他一去那儿,休养的人总是围上来,断断续续同他谈上几个小时。听众不断变换,以至休养所所长把与赫鲁晓夫谈话作为休养所的一项经常性的活动来安排。有时赫鲁晓夫走得远些,去邻近的农村。有一次,他看到一块地耕得不够精细,就请人找来农庄主席,就此事责备了他一番。这个集体农庄的主席回答赫鲁晓夫,说他已经不是政府领导人,何必多管闲事。这件事一直使他耿耿于怀。

更使赫鲁晓夫动怒的是一次与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的谈话。基里连科过去曾得到赫鲁晓夫的信任,由他一手提拔到高位。可在这次谈话中,基里连科训斥了过去的上级一通后嘲讽地说:“你倒过得挺舒服。”

赫鲁晓夫也不买账,反唇相讥:“那又怎么样,你可以从我这儿收回别墅和养老金,我可以到全国各地去乞讨,人们或许会施舍给我一些东西。可是假如你有一天去乞讨的话,谁也不会给你东西。”

这次谈话对赫鲁晓夫刺激很大,有人看见他在离开时,双手紧捂住胸口,痛苦地走出去。

第二天,赫鲁晓夫就因中风住院。

1971年,卧病一年多的赫鲁晓夫死在医院。赫鲁晓夫被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参加葬礼的人很少,没有重要人物参加,只有他的近亲和几个朋友到场。葬礼也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一切都在默默无闻中进行。

据《文史博览》刘振修/文